

王船山學術論叢

嵇文甫著

王船山學術論叢

嵇文甫著

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

嵇文甫著

新華書店發行

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開本 5.25 印張 114,000 字

1962年10月第1版 1978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

書號 2002·229 定價 0.62 元

序 言

今年是明末清初大思想家王船山逝世的二百七十周年。竊自回想，自十七八歲時即接觸到船山的著述，幾十年來，思想上一直受其影響。當 1935 年間，曾寫有《船山哲學》一個小冊子，可算是我前一階段對船山學術的一個研究小結。在抗日戰爭期間，也寫了幾篇，只是已經散失了。近幾年來，又繼續寫作。現在就把這幾篇新著和《船山哲學》及解放前不久所寫的一篇《王船山的易學方法論》合印在一起，總名為《王船山學術論叢》，作為紀念這位大師的獻禮。雖各篇所論，浮光掠影，而又凌雜重複，非系統完整之作，不足以窺見船山學術的深旨和全貌，但數十年來不才區區對船山學術所作過的一些探索已畧具於此了。

船山學術是不大容易理解的。他的著述，在清朝埋沒了許多年，最初得到賞識的只是和當代那種考據學風相適合的幾種“稗疏”，而這實在不過是船山學術的緒餘。後來漢奸地主若曾國藩之流，雖然印行其《遺書》，但他們所表章的乃恰為其屬於“封建糟粕”的一方面。直到清末，民族運動和民主運動起來，船山屬於“民主精華”方面的一些進步言論才得到表揚，而成為他們思想鬭爭的武器。自是厥後，“王船山”這個名字，一直為學術界所津津樂道。但是浮慕其名者多，認真研究者少。任取一點，隨意發揮。究竟船山學術思想的整個體系怎麼樣，他在中國思想史上佔怎樣的地位，他

和各派思想有怎樣的聯系，在他那浩瀚的議論中“精華”與“糟粕”怎樣錯綜交織着，恐怕非更加深入具體地鑽研一番是搞不清楚的。

船山有博大精深的思想體系，其內容極為豐富，是一座寶貴的礦藏，給我們多方面的啓發教育。但是他畢竟受歷史的階級的限制，對於他不應該作過苛的要求，也不應該作過高的估計。有人說船山是無神論者，依我看，倒不如說他所主張的是泛神論，更為合適。有人說船山是民主主義者，依我看，他並沒有離開儒家仁政思想的傳統。有人說船山是代表市民的思想家，依我看，他所代表的還是地主，雖然是開明的地主。船山的確有很多光輝的開明進步的思想，但總歸是一個地主思想家在那個已經腐爛透頂的，階級矛盾充分暴露的，已經有了資本主義萌芽的封建社會末期，在那個國破家亡遭受慘痛的民族災難的特定歷史環境中，所可能有的開明進步的思想。當然，這只是我個人的粗淺看法，極希望得到同行們的高明指教！

稿文甫 全 一九六二年五月六日

目 錄

序言.....	1
王船山的史學方法論.....	1
王船山的學術淵源.....	33
王船山的唯物主義思想及其唯心主義的雜質.....	47
關於王船山的階級立場問題.....	58
王船山與李卓吾.....	68
王船山的易學方法論.....	75
船山哲學.....	83
原序.....	83
上篇 性理哲學.....	85
第一章 天人性命論.....	85
第二章 理勢常變博約等.....	98
第三章 總結.....	109
下篇 歷史哲學.....	122
第一章 古今因革論.....	122
第二章 朝代興亡論.....	135
第三章 華夷文野論.....	148
第四章 總結.....	154

王船山的史學方法論

一 史學爲經世之學

明末清初一位偉大思想家和愛國主義者王船山，極致力於歷史的研究。不僅《讀通鑑論》和《宋論》是廣泛流行，人所熟知的史論名著，即許多說經論政之作，以及一些雜文隨筆，都往往涉及史學問題。他論史有許多獨到之處，而且由於他自有一套獨特的哲學體系，深入無淺語，每從具體論述中透露出他對於宇宙人生社會歷史的根本看法。他自有一套史學方法論。他認為史學乃經世之學。他說：

所貴乎史者，述往以爲來者師也。爲史者，記載徒繁，而經世之大略不著，後人欲得其得失之樞機以效法之無由也，則惡用史爲！（《讀通鑑論》卷六）

他要從史書中尋找“經世之大略”，取得前人的經驗教訓，以應用於當前的實踐。那種“記載徒繁”，專門堆砌史料的史書，他是不贊成的。他對於讀史看得很鄭重，反對“玩物喪志”那種讀法。他說：

讀史亦博文之事，而程子斥謝上蔡爲“玩物喪志”。所惡於喪志者，玩也。玩者，喜而弄之之謂。如《史記》《項羽本紀》及寶嬰灌夫傳之類，淋漓痛快，讀者流連不舍，則有代爲悲喜，神飛魂蕩而不能自持。於斯時也其素所志尙者不知何往。此之謂

“喪志”。以其志氣橫發，無益於身心也。豈獨讀史爲然哉？經亦有可玩者，玩之亦有所喪。如玩《七月》之詩，則沈溺於婦子生計鹽米布帛之中；玩《東山》之詩，則且淫佚於室家嚶呢寒溫拊摩之內。《春秋》傳此類尤衆。故必“約之以禮”，皆以肅然之心臨之，一節一目，一字一句，皆引歸身心，求合於所志之大者，則博可弗畔，而禮無不在矣。近世有《千百年眼》、《史懷》、《史取》諸書，及屠緯真《鴻苞》、陳仲淳《古文品外錄》之類，要以供人之玩，而李贄《藏書》爲害尤烈。有志者勿惑焉，斯可與於“博文”之學。（《俟解》）

這段話除對於李卓吾《藏書》等史學論著的看法，還得具體分析，另作商量外，特別值得指出的是他認爲讀史不應該是玩史。本來，“玩者，喜而弄之之謂”，這裏面有玩弄的意思，也有欣賞的意思。按說嘛，人之常情，遇到賞心悅目的事物，也不妨玩一玩。何況是古書，是經史。如所舉《史記》讀者的情況，亦文藝欣賞的常事。難道這也不許？未免有點太僧侶主義氣了吧？但是應該知道，學術研究並不只是文藝欣賞。船山很擅長文藝，很會欣賞文藝。他不是還寫雜劇，注楚辭，評選古今詩，而且有《梅花百詠》一類作品麼？他並不一味板起面孔，做出個假道學的樣子。可是一講到學術研究，讀經，讀史，那就非常嚴肅，所謂“以肅然之心臨之，一節一目，一字一句，皆引歸身心，求合於所志之大者”這樣端正學習態度，決不好說是“玩”（其實欣賞文藝也不好說是玩）。他認定治學首先要“立志”，具有一定的目的性。讀經，讀史，都是爲着要完成其“志”，求所以達到其目的。他說：

夫讀書將以何爲哉？辨其大義，以立修己治人之體也；察其微言，以善精義入神之用也。乃善讀者，有得於心而正之以

書者鮮矣，下此而如太子宏之讀《春秋》而不忍卒讀者鮮矣，下此而如穆姜之於《易》能自反而知愧者鮮矣。不規其大，不研其精，不審其時，且有如漢儒之以《公羊》廢大倫，王莽之以譏二名待匈奴，王安石以國服賦青苗，經且爲蠹，而史尤無論已。讀漢高之誅韓彭而亂萌消，則殺親賢者益其伎毒；讀光武之易太子而國本定，則喪元良者啓其偏私；讀張良之辟穀以全身，則鑪火彼家之術進；讀丙吉之殺人而不問，則怠荒廢事之陋成。無高明之量以持其大體，無斟酌之權以審於獨知，則讀書萬卷，止以導迷，顧不如不學無術者之尙全其樸也。故子曰：“吾十有五而志於學”。志定而學乃益，未聞無志而以學爲志者也。以學而游移其志，異端邪說，流俗之傳聞，淫曼之小慧，大以蝕其心思，而小以荒其歲月，元帝所爲至死而不悟者也。惡得不歸咎於萬卷之涉獵乎！（《讀通鑑論》卷一七）

這是船山批判梁元帝臨亡國而焚古今圖書十四萬卷的一段話。這裏提出“志定而學乃益”。要“書”跟着“志”跑，不要“志”跟着“書”跑。先立了“志”，然後去“書”裏面尋求“微言大義”，以幫助完成其“志”，這樣，“學乃益”。什麼是“大義”？就是“修己治人”顯赫昭著的大道理。什麼是“微言”？就是“精義入神”，把這些大道理巧妙運用的地方。讀書就是要求得這種“微言大義”，就必須有“高明之量以持其大體”，有“斟酌之權以審於獨知”，就必須“規其大，研其精，審其時”，使“書”爲自己的“志”服務。不然的話，光隨着感興、趣味、嗜好、“小慧”，漫然讀下去，這就是“玩”。許多賞心悅目的事物都可以“玩”，都會把人吸引住。“玩物喪志”。玩麻將，玩撲克，乃至玩古董，玩山水，只要玩得太厲害了，以至於成“癖”，成“癮”，都能壞事。同樣，玩書，玩經，玩史，也會陷溺人心，把平生所“志”喪

失掉。上面船山舉出許多不善讀書的例子，他甚至還把梁元帝、隋煬帝、陳後主、宋徽宗那樣的讀書，比之於“六博投瓊耽酒漁色”，比之於“蕭寶卷陳叔寶之酣歌恆舞”。（同上篇）他更斥“宋末胡元”那班朱學末流：

數五經語孟文字之多少而總記之，辨章句合離呼應之形聲而比擬之，飽食終日，以役役於無益之較訂，而發爲文章，侈筋脈排偶以爲工，於身心何與耶？於倫物何與耶？於政教何與耶？自以爲密而傲人之疏，自以爲專而傲人之散，自以爲勤而傲人之惰。若此者，非色取不疑之不仁，好行小慧之不智哉？其窮也以教而錮人之子弟，其達也以勢而誤人之國家。則亦與元帝之兵臨城下而講老子，黃潛善之虜騎渡江而參圓悟者奚別哉？（同上）

這班小儒所搞的那一套，都是“無益”的東西，和“身心”、“倫物”、“政教”全不相干。總而言之，他們都是“錮志氣於尋行數墨之中，得纖曲而忘大義，迷影迹而失微言”（同上）那不是讀書而是玩書。從這裏也可以看出船山之學，既不贊成談玄說妙，也不贊成瑣屑鉅訂，而是主張經世致用。在《讀通鑑論》末尾，解釋《資治通鑑》這個書名，他更詳細發揮讀史所以“資治”，即所以經世的主張道：

“資治”者，非知治知亂而已也，所以爲力行求治之資也。覽往代之治而快然，覽往代之亂而愀然。知其有以致治而治，則稱說其美；知其有以召亂而亂，則詬厲其惡。言已終，卷已掩，好惡之情已竭，頽然若忘，臨事而仍用其故心。聞見雖多，辨證雖詳，亦程子所謂玩物喪志也。夫治之所資，法之所著也。善於彼者，未必其善於此也。君以柔嘉爲則，而漢元帝失制以釀亂。臣以戇直爲忠，而劉栖楚碎首以藏奸。攘夷復中

原，大義也，而梁武以敗。含怒殺將帥，危道也，而周主以興。無不可爲治之資者，無不可爲亂之媒。然則治之所資者，一心而已矣。以心馭政，則凡政皆可以宜民，莫非治之資，而善取資者，變通以成乎可久。設身於古之時勢，爲己之所躬逢；研慮於古之謀爲，爲己之所身任。取古人宗社之安危，代爲之憂患，而己之去危以卽安者在矣。取古昔民情之利病，代爲之斟酌，而今之興利以除害者在矣。得可資，失亦可資也。同可資，異亦可資也。故治之所資，惟在一心，而史特其鑑也。鑑者，能別人之妍媸，而整衣冠尊瞻視者可就正焉。顧衣冠之整，瞻視之尊，鑑豈能爲功於我哉？故論鑑者，於其得也而必推其所以得，於其失也而必推其所以失；其得也必思易其迹而何以亦得，其失也必思就其偏而何以救失，乃可爲治之資，而不僅如鑑之徒懸於室，無與照之者也。

這段話講讀史怎樣可以“資治”，怎樣以史爲“鑑”，對我們很有啓發。船山認爲讀史不僅是要“知治知亂”，而更主要的是“所以爲力行求治之資”。這是明明強調“實踐”，要“古爲今用”。見古人盛衰治亂，稱頌一番，詬罵一番，空空悲喜一場，完事大吉。“臨事而仍用其故心”。依然故我，讀以前是那樣子，讀以後還是那樣子，對自己身心，對自己現實行事，不起作用，不發生影響。這樣，讀了等於沒讀，不是“玩物喪志”是什麼？要讀史以“資治”，可也不簡單。歷史上善惡是非，成敗得失，往往互相倚伏，變化多端，非開動腦筋，多費些心思，深入具體分析一番不行。“治之所資，惟在一心”。這可不是唯心主義的“心”，而是岳武穆所謂“運用之妙，在乎一心”的“心”。“設身於古之時勢爲己之所躬逢，研慮於古之謀爲爲己之所身任……”看是多麼深刻體會，實事求是的一種艱苦工夫。這必須

發揮“主觀能動性”。“史特其鑑也”。歷史只是一面鏡子。“鑑懸於室”，而“照之者”畢竟在人。只被動反映不行。爲着實踐的目的而讀史，讀史又發生反作用於實踐。船山這樣讀史的方法，頗合乎認識發展的規律，很值得我們體會學習。

船山史學既然主於經世致用，求“所以爲力行求治之資”，使坐而言者都可以起而行，所以他論史總是設身處地，斟酌至當，非率意立論者所可比。他對於兩種流行的史論都有批評：其一是庸俗的史論，其二是詭異的史論。這兩種史論相反，而都不足以經世致用。他批評庸俗的史論道：

流俗之相沿也，習非爲是，雖覆載不容之惡而視之若常。非秉明赫之威以正之，則惡不知懲。善亦猶是也。流俗之所非而大美存焉，事迹之所闕而天良在焉。非秉日月之明以顯之，則善不加勸。故《春秋》之作，游夏不能贊一辭。而豈濯濯諄諄，取匹夫匹婦已有定論之褒貶，曼衍長言，以求快俗流之心目哉？……蕭曹房杜之治也，劉向、朱雲、李固、杜喬、張九齡、陸贄之貞也，孔融、王經、段秀實之烈也；反此而爲權奸，爲宦寺，爲外戚，爲佞幸，爲掊克之惡，以敗亡人國家也。漢文景光武唐太宗之安定天下也，其後世之驕奢淫佚自貽敗亡也。漢高之興，項羽之亡，八王之亂，李郭之功。史已詳紀之，匹夫匹婦聞而與知之。極詞以贊而不爲加益，聞者不足以興；極詞以貶而不爲加損，聞者不足以戒。惟匹夫匹婦悻悻之怒，沾沾之喜，繁詞累說，自鳴其達於古者，樂得而稱述之。曾君子誘掖人之善而示以從入之津，弭止人之惡而窮其陷溺之實，屑侈一時之快論，與道聽塗說者同其紛呶乎？（《讀通鑑論》卷末《敘論》二）

人所共知的大美大惡，冠冕堂皇的大道理，說過來，說過去。你說

不對麼？都是些正論。可是千篇一律，說得太繁了，正論也變成俗論。赫赫炎炎，一片廢話。船山曾批評李綱奏議都是“綱宗之言”，什麼“報君父之仇也，復祖宗之宇也”，什麼“遠小人親君子也，議巡幸決戰守也”，……皇皇大義，綱舉目張，誰也不能說他講得不好。但是“以實求之”，並不解決問題，只能“琅琅乎其言之”，“一言而氣已竭矣”。推而論之，在李綱以前和以後，許多建言者都是這一類。“夫宋之所以浸弱浸削至於亡者，始終一綱宗之言坐銷歲月而已”。（俱見《宋論》卷一〇）平常說宋人議論多而成功少，的確，他們就是好作這種“綱宗之言”，這種空洞的原則論。其在史學方面，如胡致堂《讀史管見》之類，雖然是頗合於庸耳俗目的堂堂正論，但是總不免於一般化。船山針對這種毛病，提出自己論史的方法道：

編中於大美大惡，昭然耳目，前有定論者，皆略而不贅。推其所以然之由，辨其不盡然之實，均於善而醇疵分，均於惡而輕重別，因其時，度其勢，察其心，窮其效，所由與胡致堂諸子之有以異也。（同上）

船山《讀通鑑論》（附《宋論》）有很多深思獨到之處。他對於早為大家所公認的“大美大惡”不再去喋喋論述。他不僅要知其“然”，而且要推求其“所以然”，而且要分辨出它“不盡然”的地方。好裏邊也許有壞，壞裏邊也許有好。好是怎樣的好，好到什麼程度；壞是怎樣的壞，壞到什麼程度，他都有具體分析。同一篡奪，而曹操、司馬懿、劉裕、蕭道成有辨；同一奸邪，而秦檜、韓侂胄、賈似道、史彌遠有辨。他明白指出：“有一人之正義，有一時之大義，有古今之通義”（《讀通鑑論》卷一四）；有“一時之罪人，一代之罪人，萬世之罪人”（同上，卷二九）。他不是隨便發些主觀的空議論，而是“因其時，度其勢”，具體研究當時的實際情況。他還要“察其心”，分析其

動機；“窮其效”，推究其效果。比如他論曹操、桓溫、劉裕，以及分析景延廣抗遼和岳飛抗金的形勢等等，都具有特識。這是船山區別一般庸俗史論的地方。

庸俗的史論，雖然膚廓無聊，爲船山所反對，但是尙認爲無害於世道人心。他更爲極力指斥的，是另有一種詭異的史論，一種“織曲嵬瑣之說”：

蓋嘗論之，史之爲書，見諸行事之微也，則必推之而可行，戰而克，守而固，行法而民以爲便，進諫而君聽以從，無取於似仁似義之浮談，祇以致悔吝而無成者也。則智有所尙，謀有所詳，人情有所必近，時勢有所必因，以成與得爲期，而敗與失爲戒，所固然矣。然因是而卑污之說進焉。以其織曲之小慧，樂與跳蕩游移陰匿鉤距之術而相取；以其躁動之客氣，迫與輕挑伎忿武健馳突之能而相依；以其婦姑之小慈，易與狐媚猫馴湏忍柔巽之情而相昵。聞其說者，震其奇詭，歆其纖利，驚其決裂，利其响嘔，而人心以蠱，風俗以淫，彝倫以斁，廉恥以墮。若近世李贄鍾惺之流，導天下於邪淫，以釀中夏衣冠之禍。豈非逾於洪水，烈於猛獸者乎！溯其所由，則司馬遷班固喜爲恢奇震耀之言，實有以導之矣。讀項羽之破王離，則鬚眉皆奮而殺機動；覽田延年之責霍光，則膽魄皆張而戾氣生；與市儈里魁同慕汲黯包拯之絞急，則和平之道喪；與詞人游客共嘆蘇軾蘇轍之浮誇，則惇篤之心離；諫而尙譎，則俳優且賢於伊訓；謀而尙詐，則甘誓不齒於孫吳；高允翟黑子之言，祇以獎老奸之小信；李克用三垂岡之嘆，抑以侈盜賊之雄心。甚至推胡廣之貪庸，以抑忠直而慚鄙夫之志；伸馮道之逆竊，以進夷盜而順無賴之欲。輕薄之夫，妄以爲慷慨悲歌之助；雕蟲之子，喜以

爲放言飾說之資。若此之流，允爲殘賊。此編所述，不敢姑容。刻志兢兢，求安於心，求順於理，求適於用。顧惟不逮，用自慙惡，而志則已嚴，竊有以異於彼也。（《讀通鑑論》卷末《敘論》三）

船山一方面反對那些貌似正經的迂腐俗論，而務求有助於實用；但是另一方面，他也仍然反對脫離正軌，走向邪僻小路，像那些“卑污之說”。他舉出一系列例子，把李卓吾那班人一些大胆的違反儒家正統觀念的，也可以說是“非常異義可怪之論”，簡直比之爲洪水猛獸。他甚至對於司馬遷班固那些“恢奇震耀之言”，描寫得有聲有色，激動人心的地方，也都有所非議。這裏面有些地方自然也不免囿於封建士大夫傳統的階級成見。可是他的確是一本正經地作兩線鬭爭而力求斟酌至當，非故意標奇立異，譁衆取寵者所可比。他的態度是嚴肅認真的。如果說“因其時，度其勢，察其心，窮其效”，是對庸俗的史論下一針砭，那麼“求安於心，求順於理，求適於用”，也正是對詭異的史論下一針砭。從船山對於這兩種史論的批評中，也可以見得他爲經世致用而治史的精神。

二 歷史聯系時事

船山不是爲讀史而讀史，傷心人別有懷抱，比物連類，一觸即發，是講歷史，也是講現實，處處聯系到當前時事上。說他“古爲今用”也好，說他“借古諷今”也好，總之，他是把古今打通一氣，感慨寄托，言在此而意在彼，只有把明清間政治社會情況和船山史論合并來看，有些問題才能理解得更爲深刻。首先看他強烈的民族思想。他說：

仁以自愛其類，義以自制其倫。……今族類之不能自固，而何他仁義之云云。（《黃書》《後序》）

可禪、可繼、可革，而不可使異類間之。（《黃書》《原極》）

夷狄者，殲之不爲不仁，奪之不爲不義，誘之不爲不信。何也？信義者，人與人相與之道，非以施之異類者也。（《讀通鑑論》卷四）

他看得民族高於一切。什麼倫理道德，講仁，講義，都是爲着自固其族類。“禪讓”也好，“革命”也好，“繼世而有天下”也好，都是自己族類內部的事情。他把“夷狄”直看作“異類”。我們和“異類”，沒有什麼道德仁義可講。我們知道明朝是亡於異族的。船山身遭國難，創鉅痛深，所以有這樣強烈的民族思想。在他的史論中，每一觸到漢族和其他民族間的問題，總不勝其感慨地長言永嘆而不能自己。他大罵“孤秦”和“陋宋”，因爲他們只圖鞏固自己一人一姓的權位，不惜箝制臣民，削弱中國，而因以潰決華夷的大防。特別是“陋宋”，瑣瑣斗筭，敗壞自己民族，太不像樣了，所以書中隨處流露，不斷加以鞭撻。他不僅罵秦檜爲“大憝元凶”，罵桑維翰爲“萬世罪人”，即蔡謨、孫綽、王羲之，號稱爲晉代名流者，亦因其進畏懦之說，阻撓北伐大計，而毫不予以寬假。他稱贊景延廣反抗契丹“雖敗猶榮”，謂韓侂胄“北伐非其罪”，而對於能進軍中原，一振華夏聲威，如劉裕和桓溫，更極力爲之洗刷揄揚。乃至對於歷史上所謂“勤遠略”的人物和事迹，他都不拘守傳統見解，而予以好評。很明顯，這種強烈的民族思想，是和船山的身世之感聯系在一起的。爲着熱愛自己的民族而不斷鞭撻那些獨夫民賊，這是船山思想最光輝的一面。其分析敵情虛實，如論寇準澶淵之役等，亦爲害恐敵病者下一針砭。

再看他論怎樣對待農民羣衆的問題。我們知道，船山生長在明末李自成張獻忠農民大起義的時代。他對於農民羣衆的浩蕩聲勢和巨大威力，有很深刻的印象。因而怎樣對待農民羣衆，特別是怎樣對待震蕩蠡起的農民羣衆，就成為他史論中時常注意到的重要問題。他極佩服漢光武，對於他綏靖農民的經世大略反覆稱道。他深深體會，光武不論在戰時和在戰後，都是“以柔道行之”，“一以從容鎮靜結已服之人心”，這是他成功的妙訣。（《讀通鑑論》卷六）他說：

光武之始徇河北，銅馬諸賊幾數百萬。……蓋先後所受降者指窮於數。戰勝矣，威立矣，乃幾千萬不逞之徒，聽我羈絡，又將何以處之耶？高帝之興也，恆患寡而亟奪人之軍。光武則兵有餘而撫之也不易。此光武之定天下所以難於高帝也。夫民易動而難靜，而亂世之民爲甚。當其含耒而操戈，或亦有不得已之情焉，而要皆游惰驕桀者也。迨乎相習於戎馬之間，掠食而飽，掠婦而妻，馳驟喧呶，行歌坐傲，則雖有不得已之情而亦忘之矣。盡編之於伍，而耕夫之粟不給於養也，織婦之布不給於衣也，縣官宵夜以持籌不給於饋餼也。盡勒之歸農，而田疇已蕪矣，四肢已惰矣，恣睢狂蕩不能受屈於父兄鄉黨之前矣。故一聚一散，傾耳以聽四方之動，而隨風以起。誠無如此已動而不復靜之民氣何矣。而光武處之也不十年而天下晏然。此必有大用存焉。史不詳其所以安輯而鎮撫之者何若，則班固苟悅徒爲藻悅之文，而無意於天下之略也。後起者其何徵焉。無已而求之遺文以仿佛其大端，則徵伏湛，擢卓茂，獎重厚之吏，以調御其囂張之氣，使惰歸而自得其安全。民無懷怨怒以擯之不齒，吏不吝教導以納之矩矱，日漸月摩，而消其形迹。數